

要承担上百个项目,结果工作精简的部门A考核优秀,部门B因为只完成90%的任务,处于考核劣势。受访干部普遍表示有过突击应对考核的经历。“考核要的那些东西,就算我没有,到最后也能‘变’出来。”一名基层干部无奈笑言。东部某省一乡镇党委书记透露,年中的一些考核,政府部门都会向属地大企业“借”一些数据,例如半年报数据就“借”到9月份。考核方式的形式主义问题也普遍被诟病。考核结果的好坏,似乎就取决于迎检迎考的材料准备是否到位。据一位驻村干部介绍,准备材料是必不可少的。以一项检查工作为例,汇报材料共分九大类,每一类有五六个小点,每个小点要两到三份材料,一份多则七八页,少则两三元,摞起来接近三本书的厚度,检查人数多的时候,材料得用车装。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部分地区还在片面追求漂亮数据,对科研投入、人才引进、企业培育等方面的指标避而不考。这样的考核结果,只能是导向出错、南辕北辙。

## 基层“神仙打架”闹剧何以终结

王石川在3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文章说,《半月谈》杂志近日报道,一些多部门交叉施政的领域存在决策“翻烧饼”现象。部门之间“神仙打架”,基层成了“角力场”,让基层干部做工作左右为难,基层群众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报道提到一

个令人痛心的案例:中部一农业大县规划了一个“农光互补”的光伏农业一体化项目,乡镇很快建起来了,一切符合预期。可当收益即将装进群众腰包时,县国土部门称该项目建在了基本农田上,必须限期整改。何以破解“神仙打架”?相关人士开出了药方:法规要理清,权责要对等。问题是,“神仙打架”的低级错误不是早该避免吗?职能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不是本该同心协力、协同推进吗?中央深改小组会议曾强调:“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有学者研究发现,协同工作也是国际惯例,其直接目标即消解部门分割的碎片化管理困境,通过组织重构、预算整合、政策目标分享、信息共享等途径,来提高公共决策的质量。因信息不畅、各自为政而导致资源浪费、公帑靡费,实在让人痛惜。事关公共利益,职能部门多一些补台意识,少一些拆台思维,将协同治理落实到位,势必能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神仙打架”现象。

## 人大代表呼吁进行脑死亡立法

据3月6日的《法制日报》报道,“脑死亡已被科学证实是不可逆转的死亡,病人脑死亡以后,就没有了自主呼吸,抢救脑死亡者对患者起死回生没有任何意义,这个过程反而会耗费很多医疗资源,也增加了病人家庭的经济负担。”继2015年、2016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提出脑死亡立法

建议,今年,连任的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再次提出加快脑死亡立法的建议。“靠着一个呼吸机维持着病人的心跳,对死者来讲也是不尊重的。”陈静瑜举例说,“比如一个因为车祸而脑外伤的病人来到我们医院进行救治,尽管临床专家通过脑电图等仪器,按照临床标准做出病人已经脑死亡的判定,但很多情况下家属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会说,病人的心脏还在跳呢,怎么就说已经死了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就要耗到这个病人心脏也不行了,两个肺也因为插管而感染,整个过程会延续很长的时间,也许是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这期间,病人会花费非常多的费用。”除此之外,脑死亡还会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现在大型综合医院ICU一床难求。很多情况下,真正意义上值得抢救的病人因为脑死亡病人占用资源,而没办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陈静瑜说。据了解,目前包括美国、日本等在内,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已有脑死亡的立法。全球有大概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式承认脑死亡。而在我国,由于没有脑死亡立法,诸多法律问题难以解决。“死亡的界限标准不统一,确定死亡的时间不一致,可引起遗嘱纠纷、保险索赔纠纷、职工抚恤金以及器官移植纠纷、‘不合理’死亡的认定等法律问题,也直接影响到法律上的继承问题,婚姻家庭关系中抚养与被抚养、赡养与被赡养以及夫妻关系是否能够自动解除等问题。”陈静瑜说。